



党史上的为什么（1）

五四运动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 罗平汉

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史的兴趣日益浓厚，同时，在学习中也提出了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思想通信”栏目邀请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罗平汉教授作答，形成一组“党史上的为什么”文章，敬请读者关注。

——编者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宣告结束。1919年1月起，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然而，中国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不但遭到拒绝，而且会议竟然规定德国在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中国人民积蓄已久的反帝爱国情绪如火山般爆发出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示威，要求“外争主权，内惩国贼”，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由此爆发。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的各阶层，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几日之间达到了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波及全国20多省的100多个城市。在国内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中国代表没有出席6月28日巴黎和会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这也正是五四运动与以往的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同之处。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的主要矛盾也由原来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要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反帝反封建就成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主题。这种革命从其范畴来说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是由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而五四运动之后，虽然革命的任务仍然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的对象也仍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再是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既然如此，五四运动之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就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五四运动既是反对帝国主义的

运动，又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运动，它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中国人民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始终企盼着民族的复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国家与民族的出路，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奋斗。这其中，有地主阶级改良派开展的洋务运动，有农民阶级浴血奋战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但是，洋务运动破产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失败了，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顽固派破坏，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男人剪掉了辫子，女人可以放开小脚，国号由大清改称为民国，但它并不是人民的国家，中国依然是那样贫穷落后，依旧是那样的四分五裂，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五四运动的发生，正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危机步步加深的背景下，各种社会矛盾斗争的总爆发。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遭受外交失败，再一次陷于民族危难。通过这件事，中国人民从此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貌。毛泽东曾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积蓄已久的爱国热情由此喷发。参加爱国斗争成员如此广泛，各阶级各阶层群众如此一致地共同行动，是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五四运动是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后来，上海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再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运动中喊出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赋予反帝反封建斗争新的内容，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由此翻开新的篇章。



五四运动又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地向西方学习，并且经历了从学“器物”学“制度”再到学“思想”的转变。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不久改名为《新青年》），它以青年群众为主要的读者对象，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当时，西方各种主义和思潮纷纷涌入中国。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传播，但既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未为人们所重视，即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少数知识分子，也仅将之作为西方的一个学术派别来看待。

五四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发生的。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际遇就大不一样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革命成功的俄国，在政治经济上与中国有着许多相同或接近的地方，而它在革命胜利后又以反对帝国主义相号召，并且主动宣布废除帝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特殊的好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先进分子的代表李大钊、陈独秀等，满腔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遗余力地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加以宣传介绍。在这个过程中，不但他们自身完成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到初步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而且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也使一批和有着他们共同理想的先进青年，如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等等，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于是有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群体。

对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毛泽东有过形象的比喻：“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总之，

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就开始意识到组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

五四运动后期工人成为运动的主力，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上中国政治的舞台。五四运动的另一结果，是使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他们脱下长衫，来到工人中间，了解工人的悲惨生活，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开办工人夜校，提高工人的文化知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思想感情进一步转变到工人阶级方面，实现了知识分子的工人阶级化。同时，一部分工人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而提高了阶级觉悟，这就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和干部条件。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直接推动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就有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革命就有了新的领导核心力量，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最根本的特征。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修好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必修课

□ 何逢阳

为政之道，修身为本。坚强的党性，是成为高素质领导干部的首要条件。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也是共产党人的“心学”。但是，干部的党性修养、道德水平，不会随着党龄工龄的增长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在新时代，要打造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就必须持之以恒抓好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加强党性修炼，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不断提高共产党人的党性觉悟，努力做到心中

有光、内心通透、温润如玉。

要以理想信念点亮心中明灯。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前行的路上不可能一路光明，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唯有保持光明心并自带光芒，时刻照亮自己前行的路，才不至于在前行的路上迷失方向，甚至跌落深渊。自带光芒站位要高，不能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任由“灯下黑”现象发生。自带光芒强度要大，不仅要照亮自己的路，还要尽可能照亮他人的路。

要用哲学方法提升思维层次。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内心要达到通透，

提升思维层次至关重要。提升思维层次，首先要躬身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得越多，思维层次才能提升得越快。思维层次要按规律逐级提升，不可好高骛远，不可拔苗助长，更不可叶公好龙。提升思维层次的要诀在于哲学思考，简单地就事论事不可能提升，过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也不可能通透，只有学会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分析问题，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达到内心通透的境界。

要常反观自省沉淀党性气质。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要教育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强化自我修炼。重点是要坚持每日三省：是否

有雍容自若的神采，为人处事能否做到谨言慎行、不露锋芒、不事张扬；是否有容人之量的气度，与人相处能否怀有开阔心胸、通透的眼光、君子的雅量；是否有成熟圆润的智慧，待人接物能否坚持个性、收敛锐气，做到游刃有余。要在不断的自省中，持续沉淀心性，力争做到温润如玉，正如谦谦君子，言行举止从容有度，与之交往如沐春风。

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应当通过长期深入的修炼，以理论信念的坚定确保政治方向的坚定，以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致保证思想行动的一致，不断修炼干净的内心，努力让自己心中的世界成为眼里的世界。

（作者系安徽省界首市委副书记、市长）

结合就是把彼此关联的事物有机统一起来，也就是通常说的统筹兼顾、“两手抓”。倘若把上下、左右、内外、点面上的相关事物统筹连接在一起，则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孤立地、片面地和割裂开来地顾此失彼，则事倍功半。以下十个方面问题，如果能够结合得好，可以事半功倍、行稳致远。

一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主观乃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客观乃人的意识以外的物质世界。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主观和客观是对立的统一，客观是不依赖于主观而独立存在的，主观则能动地反映客观并对客观事物起促进作用。要想做成事，主观努力从来都是第一位的，起着决定性作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不吃苦、不受累天赋再高也一事无成。不过，有些事尽力了却未必尽如人意，或同样的努力却不尽相同的效果，这说明还得靠“天时地利人和”。结合客观条件不具备、可不可能、成熟不成熟，来确定哪些事可为、不可为和不可为，切不可搞“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等脱离实际的硬干、蛮干。“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上”，尽力而为且量力而行，做“跳起来摘桃子的事”，便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

二是治标与治本的结合。标与本也就是现象与本质。治标就是把那些已经暴露或表现出来的矛盾和问题尽早尽快地解决掉，而治本则是透过现象抓本质，把问题背后的问题找出来处理掉。治标不是目的，是为治本赢得时间和创造条件的；治本就是从源头、根本上治理，它是落脚点。如果治标而不治本，或只是停留在治标上，那么矛盾和问题不但容易出现反复或反弹，而且治标的成效终归会流失；如果只想着治本，却对表面的问题视而不见，那么治本的愿望也终归难以实现。中医讲究的是急治其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从联系的观点来看，治标是治本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治本是治标的根本所在，得先标本、重在治本，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三是眼前与长远的结合。“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任何事业有成者都是从干在当下、做好眼前的点滴事情开始的。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方能行稳致远。然而，偏偏有那么一些人，自诩要“扫天下”，却不愿“扫一屋”，好高骛远、好大喜功，对眼前事、当下活不愿也不屑去做。还有一些人只盯着眼前那点具体事干一天算一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浑浑噩噩，对未来没方向、没规划、没预期。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把干在当下与谋划长远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成大业、干大事，成为有理想有抱负的实干者。

四是局部与全局的结合。局部是全局的支撑，每一个局部都是全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局部方能构成完整的全局。要想维护好、巩固好和发展好全局，离不开搞好局部、干好本职。从一定意义上说，搞好局部就是搞好全局。然而，“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任何时候都要心存“国之大者”，对大局、大势和大事了然于胸，做到心有全局、眼有全局，学会把局部的事情放到全局下去思考和谋划，善于在全局下行动。胸怀全局者才能更好地搞好局部。然而，现实中有的人似乎只对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感兴趣，只扫“门前雪”，结果“门前雪”也干净不了，那“一亩三分地”最终也会荒芜。“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独秀不是春”在彼此关联、休戚与共的时代里，“孤岛”是不存在的，独善其身是不可能也做不到的。

五是刚与柔的结合。刚柔相济、软硬兼施，能文能武、张弛有度，这既是很管用的做事方法，又是很重要的做人性格。《周易·蒙》中说：“刚柔节也。”刚柔并济就是刚强与柔和的相互调节，做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人不可一味地强硬，该放下身段时则适时适当地放下身段，示弱而不好强、示弱而不软弱，一介武夫不可、一介书生亦不行。正所谓“凡为将者，当以刚柔相济，不可徒恃其勇”。施以严厉与待以温暖、无情管理与有情操作，是不可或缺、相得益彰的“两只手”，就得学会打一下摸一下。刚与柔的结合就是严管与厚爱的统一，对不当之处、错误之举毫不留情、声色俱厉，当困难之时、事情过后又关心理解、关爱照顾。这种无情中的有情、原则中的灵活则是刚与柔的统一。

六是学与用的结合。学归学、用归用，学以致用是不少人的通病。现实中，有的人自以为聪明或经验多，认为学不学、学多少都一样，总觉得自己的经验够用了，习惯于路径依赖，麻醉于“眼睛一睁，忙到熄灯”，看似忙忙碌碌，实则多半在做无用功；而有的即使学习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浅尝辄止、蜻蜓点水，不善于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群众学，既读不好“有字书”，又读不懂“无字书”。磨刀不误砍柴工，任何时候都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也是一种用，尤其是在思的基

做人做事做官的『十结合』

□ 徐文秀

础上转化为用更加重要。学而不用，则白学；不学而用，则瞎用。学习的成效是通过运用得以体现的。我们一方面要时刻注意学习，另一方面又要善于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充分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学中干、干中学，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学有所用和学有所成。

七是知与行的结合。知乃明白事情的道理，行便是去身体力行。知是行的前提和基础，不知而行是一种盲目；行是知的落脚点和目的地，知而不行是一种自欺欺人。知与行本应该是合一的，可是现实中却有不少人明明知道事情的道理，但往往不去践行，有的甚至还端着明白装糊涂，装睡不醒。知易行难、知行不一，成了不少人的顽疾。“知而行之则善，知而不行则耻，不知而不行则庸，不知而行则可怕”。什么时候知行合一、言行一致了，什么时候就赢得了人心、走向了成功。

八是务实与务虚的结合。干任何一项工作，实是底色，虚则添色。实就是说实话、干实事、做实在人，一切实事求是。从现实看，“实打实”做得不够是不少人的常见病，一些人说话办事往往“虚浮夸、假大空”，水分多、不靠谱，或纲领口号一大堆，落地见效却不够，甚至在一片所谓的落实声中落空。讲究实既是一种价值追求，也是一种作风品格，做人做事做官首先得实。一方面崇尚实干，另一方面还得学会务虚。时常“踱方步”，进行冷思考，登高望远、战略谋划，从思想理论、政策策略等作规划设计。务实与务虚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务实是执行操作环节，务虚是决策决定环节，两者贯通结合，则使行动更加有力有效。

九是数量与质量的结合。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的，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成功就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一定的数量是质量的基础和保证。正因为如此，追求一定的数量和质量，是必须也是必要的。然而，“盖所以为精金，在足色而不在分两”。数量固然重要，高质量更为重要。现实中，重数量轻质量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更在乎论文发表的数量、开会发文的件数和下基层调研的次数等，而对论文质量、开会发文效果和调查研究成果及转化率等，却不闻不问、漠不关心，结果出现各种各样“大而不强、多而不好”的问题。坚持数量和质量一齐抓、一齐要，而且重质量高于胜于重数量，才是数量与质量相结合的要义所在。

十是“又红”与“又专”的结合。红与专指的是政治与业务。“没有离开政治的业务，也没有离开业务的政治。”政治与业务本质上是分不开的，这不仅因为业务需要政治来引领指导、来把关定向，也因为政治如果一旦脱离了业务就是空头政治，讲政治也就成了“空谈政治”，成了“两张皮”。具体到每个人而言，政治是一个人对事物的立场观点、态度方法，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此，人是“不能不政治的”。有的人习惯于以专家学者或“业务干部”自居，自以为政治与己无关或隔得遥远，有意无意地回避躲避政治，甚至天真地以为只要把手头业务搞好了就可以了。毛泽东曾经说过，“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同样的道理，不懂政治的人谈不上真正懂业务工作，因为它只会就事论事，不懂事物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不善于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结果迟早会把业务工作包括自身给带偏，甚至带到歪路邪路上去。

